

# 改革痛史的地方性叙事

## ——评楚荷长篇小说《苦楝树》

李 婷, 刘郁琪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楚荷的长篇小说《苦楝树》, 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视角来探察国有工厂的兴衰史, 企图对198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改革文学”进行历史化的超越。它避开以往改革文学仅关注工厂领导层的叙事惯例, 聚焦底层职工生活, 着力表现改革过程中的人性之痛, 并创造性地再现和建构了以湘潭为依托的地方性知识, 是新世纪以来改革文学的又一力作。

[关键词] 《苦楝树》; 改革小说; 史诗性小说; 人性痛苦; 地方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4-0084-05

### Local Narrative of Painful Reform History

#### ——Comment on Chu He's Long Novel of *Neem Tree*

LI Ting, LIU Yu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Chu He's long novel *Neem Tree*, which explores the rise and fall history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ordinary worker, attempts to historically transcend "reform literature" since the early 1980s. It eschews the previous reform literature which concerned only with factory leadership narrative convention, and focuses on bottom lives of the workers. The novel shows the pain of humanity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and creatively reproduces and constructs the local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Xiangtan. It is another successful attempt in "reform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Neem Tree*; reform novels; epic novel; the pain of humanity; local narrative

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先导, 中国文坛兴起了“改革文学”的创作热潮, 这一时期的“改革文学”聚焦于改革者与保守者的矛盾冲突, 并怀抱着“只要改革, 生产就能搞上去”的理想, 塑造了一系列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改革家。1982年以后, 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 《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开始关注改革后的精神震荡与道德困惑, 着重表现人们在改革运

动中的命运沉浮、喜怒哀乐。1980年代后期以来, 改革题材作品向多元化发展, 《烦恼人生》表现普通工人生活的“疲惫不堪”, 《大厂》揭示在各项人事关系面前厂长的“穷于应付”, 《抉择》专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问题, 等等。新世纪以来, 改革文学出现了新面貌, 开始将笔力倾注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人民, 关注改革过程中底层工人所经历的辛酸与痛苦, 楚荷的长篇小说《苦楝树》就是其中的

收稿日期: 2013-09-2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演变论”(2010YBA099)

作者简介: 李 婷(1990-), 女, 湖南醴陵人, 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刘郁琪(1977-), 男, 湖南邵阳人, 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叙事理论与现当代文学影视叙事。

典型。

### 一 “改革文学”的历史化超越

《苦楝树》描绘了某国有工厂从建成到辉煌到最后在国有企业改革浪潮中被迫破产倒闭的历程,有为国有企业立传写史的气魄。小说企图以这种历史厚重感对以往的“改革小说”形成历史化的超越。但作品在进行“历史化”的叙写时,并没有实现“历史化”的超越。

楚荷的《苦楝树》延续改革题材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书写了湘潭某国有大厂从建厂到繁荣到最后在国企改革浪潮中被迫倒闭的三十几年历史。但是小说却在文体结构上同以往的改革小说相比有创新之处。纵观以往的改革小说,从《乔厂长上任记》到《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再到《烦恼人生》《大厂》《抉择》等,它们大都运用“横截面”方法结构全篇,而《苦楝树》却以史诗化的笔法叙述了国有工厂、工人的成长史。

“横截面体小说”是胡适界定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时提出的概念:“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sup>[1]</sup>其所指就是小说的行文集中“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sup>[1]</sup>虽然胡适是用这个来界定短篇小说,但这个概念并不局限于短篇,许多中篇小说作家也倾向于集笔力于事实中最精彩、矛盾中最尖锐那一部分,来对全国全社会的某些现象进行反映。《乔厂长上任记》择取乔光朴临危受命前往重型电机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机电局长的支持下冲破反改革者设置的重重阻碍等情节,紧凑而精彩。小说就是截取改革过程中的这一段进行集中描写,突出改革者的惊人魄力与改革事业的势在必行。《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都是选取最有利的材料集中描写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揭示改革的必要性及艰难性。新写实主义作品《烦恼人生》就选取了印家厚的一天来反映普通工人“庸常琐碎的生存状态和烦恼无奈的人生体验。”<sup>[2]</sup>“现实主义冲击波”所带来的作品《大厂》截取的是春节刚过完的几天内发生的事,接二连三的

问题搅扰得厂长吕建国焦头烂额不得不疲于应付,展现的是作为国有大厂负责人的种种无奈与被迫随波逐流的担忧,等等。以往的同类题材小说大都不约而同地采取“横截面”的方式进行写作,这样能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果,集中所有精力描述最具爆发力的一段生活,自然精彩绝伦。

《苦楝树》却并没有遵循以往改革文学的创作经验,而是以一种成长性小说的方式来叙述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的历史,时间跨度很大,颇具史诗气魄。黑格尔认为:“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必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联系上,必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的具体形象,而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史诗的内容和形式。”<sup>[3]</sup>可见史诗化小说是表征民族国家叙事的载体。从审美的角度看,艾卜拉姆斯提出:史诗“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起码符合下列标准的作品:长篇叙述体诗歌,主题庄重崇高,风格典雅,集中描写以自身行动决定整个部落、民族或人类命运的英雄或近似神明的人物。”<sup>[4]</sup>按以上标准来衡量现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建国以后的文学史,“17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是史诗的典型。时过境迁,在当今文学文化环境下,人们已经不再那么追崇史诗性,有些反而以一种“反史诗”的姿态出现。现代小说的史诗化倾向也同时发生了改变:“对于现代小说的‘史诗形式’,则主要指现代小说在主题上表现民族国家叙事的特色性,在叙事上注重扩大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以及小说的历史总体性、客观性。在小说形式上,则讲究小说的故事完整性、现实深刻性,以及人物的典型性。”<sup>[5]</sup>《苦楝树》从历时性角度,描绘了改革的全部历程,甚至从“吴满们”开山建厂写起,一直写到1998年大改革,工厂破产,工人“下岗”。小说将个人经历与企业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勾勒整个国有企业发展历程,具有史诗化的动机和气象。

《苦楝树》虽有史诗性的动机与追求,但这条路却走得并不顺利。既然“改革史”是小说的主要结构线索,作品的叙事就应该始终保持足够的张力,让前后情节协调。但目前,作品仅仅在工厂面临改革,工人想尽办法保住饭碗,“满哥们”被迫下岗这些情节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高潮太高,显得前

面那么漫长的叙述就非常平淡。相信每一个读者看完后,都会留下相同的印象:这个高潮太出彩了,以至其它部分简直无法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作为长篇小说,其前松后紧的结构设计,无疑是叙述上的一大瑕疵。或者说,它虽然有了历史的长度,却缺乏厚重感,这是作品的一大缺憾。

## 二 改革中的人性和文化之痛

改革既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更是触及灵魂、观念的思想革命。或者说,表面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实质则是灵魂观念的革命。作者曾说过:“我生活在最底层,当然只会用最底层的视角,去写底层人物的爱和恨,写他们的追求,写他们的高尚和卑鄙。原来叫做‘主人’,现在叫做‘打工仔’的工人的痛,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标志性的痛之一。”<sup>[6]</sup>文学是人学,《苦楝树》的高明在于,通过不同人物身份的选择和设置,不仅写出了表面的利益斗争,更写出了骨子里的人性和文化之痛。而这一切在其高潮部分显示得极为明显。小说的高潮部分,就是痛感呈现最为清晰也最为强烈的地方。

与以往的改革小说不同,从改革主导方来看,《苦楝树》所表现的是改革过程中利益调整的“分享艰难”。作为国有大厂的负责人,“王厂长”是政府、企业、工人三者间利益的桥梁,按小说里新市长的说法:“作为国营企业的厂长,第一,代表着政府,……有义务为作为独资的政府,争取最大的效益。这个代表,严格地说,是国营企业厂长最根本的代表。其二,代表着企业,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的权益。……其三,代表着广大员工,必须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利益。掌握了这三个代表,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厂长。”可以说改革活动中,厂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改革小说中,改革的主导者大多是站在前线冲锋陷阵,像乔光朴一类,他们认定改革的光明前程,排除万难,大刀阔斧地革除保守势力、提拔先进人才、改进生产技术,风风火火地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工作。在国家能更富强、企业能走上发展道路、工人能获得高品质生活的三方获益的美好前景下,改革主导者们奋力前行。

然而在《苦楝树》中,作者表现了改革的另一面,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国企厂长。在现代经济体制下,国企改革势在必行,各方必然经历难以忍受的阵痛。然而改革不是破产,阵痛不是绝望,现实

生活中的国企改革却变了味。作品展现的正是这样变了味的改革,以及在这场改革中艰难应对的厂长。王厂长知道国企的出路在于改革,“不彻底砸破计划经济时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就没法儿立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他也很愿意企业通过改革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彻底改革用工制度,首先就要做到减员增效砸饭碗。”王厂长难以下决心,他不愿意砸掉任何人的饭碗。在改革过程中他努力寻求政府、企业、工人三者利益的平衡点,“希望通过若干年努力,在没有阵痛中,用愚公簸箕担大山、子子孙孙担下去的法子,慢慢地完成减员增效。”他的具体措施是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厂里业务、提高业绩,用“浩浩荡荡的标语改革”应对市里面的改革压力,与新市长进行死皮赖脸式的斡旋。然而其结果却是失败的,“四零五零”政策淘汰了许多技术中坚,最终落得个企业破产、工人下岗的后果,改革最终使得各方不得不“分担”艰难。

小说的重心,显然不在王厂长的塑造——这是以往改革文学的叙事惯例,田文兵在他的论文中也曾说:“显然作家的目的并不在于怎么去塑造叱咤风云的改革者形象,而是生动而又真实地展示了厂里普通工人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sup>[7]</sup>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最集中地体现出改革背后的人性之痛。尤其是那个装得很幸福、却打两份工的天车班女工——“梅毒”形象,显然具有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典型深度。她用光鲜的外表、强悍的声音把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煎熬包装起来,宁让人厌恶也不愿把自己的伤疤揭给人看,以此来博得众人同情。“梅毒”的痛苦无人知晓,别人只看到她光鲜亮丽、尖酸刻薄的一面,“减员增效”浪潮袭来,她首当其冲成为“准下岗人选”。被逼无奈,她走上“维权”之路,讨好各方人员,送礼,色诱,各种“梅毒式”的手段都用尽,然而这并不奏效。最后只得将自己的痛苦展示给人看,求得“满哥”原谅,才获得王厂长的“特赦书”。之前她将自己的苦难藏起来,只让泪水在自己心里流,而改革却迫使她不得不揭开那层伪装,将自己的痛苦暴露在人前。原来的苦心经营瞬间崩溃,这对于一个外表强悍而内心脆弱的女子来讲,要经历莫大的心理煎熬和痛楚。将不幸的自己包装起来固然难忍,而将这层包装纸撕开同样也是一件痛苦之事,“梅毒”在伪装与撕开伪装间忍受着双层痛苦。改革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的泪水,包含着多少人性的“洗礼”,从“梅毒”“瘦妞”“太岁”等

人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小说的出彩,在于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主人公形象——吴满,他是底层职工,但又与上层有着特殊的关系(救过王厂长),他技术过硬、无职无权,却深具影响力,是工厂里面的“无冕之王”。这种独特的身份,使他眼光中的改革别具文化的味道——他对改革的打量,不仅仅是利益,也不仅仅是人性,更是文化。通过“吴满”的视角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某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实在体破产,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中形成的工人的传统情感、企业文化也失落了。作为企业的一员,吴满与周围的人建立的是深厚情谊,他当然不愿看到任何一个人被砸破饭碗。作为“满哥”,工厂里的“无冕之王”,吴满本来有着自己的一套办事原则,但面对真正的要“减员增效”、砸人饭碗时,他还是为“太岁”是否该下岗犹豫不决,了解真相后为“梅毒”向王厂长求情,为“瘦妞”甘愿冒生命危险。吴满是善良的,厂里面的人都尊敬“满哥”、感谢“满哥”,然而最终他却因为“四零五零”一刀切的政策而被下岗。起先他为别人奔走忧心,想不到最终自己却因为近乎荒诞的原因成了“受害者”。在这一事件中,“无冕之王”并不能战胜现实的残酷,反而被无情地抛弃,美德与利益之间形成残酷的悖论。

在道德经历改革洗礼的同时,国有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也被改革异化了。“企业的核心是价值观,是企业群体认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是非契约性的规范。”<sup>[8]</sup>在过去的国有企业中,工人们具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双手撑起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他们可以自觉地团结起来抗拒吞噬一切的“洪水”,他们是工人阶级是国家是工厂的主人。在这样的企业文化熏陶下,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在情感上认同并依赖着他们当做“家”的地方。他们真正地“以厂为家”,每天都活得乐呵乐呵,穿着那件“破得完完全全可以丢进垃圾堆”的“全民职工”的衣服,甚至宁愿拿着工厂的低工资,也不愿下岗。“使小说中的工厂生存下去的,似乎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力量,而非仅仅是物质力量。”<sup>[9]</sup>工人们凭着这股精神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工厂破产以后,工人们各奔东西,原来的企业、原来的家人们只存在他们偶尔的回忆里,原来那种感情所根植的土壤没有了。像“吴满”“刘哥”这样的高级技工进入到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能有不错的待遇,甚至比在国企时的工资要高很

多倍,但他们也还是会发这样的感慨:“我们原来那厂子,虽然垮了,心里却总觉得如同自己的家一样。如今这厂,吃住老板的,还给这么多钱一个月,却老觉得陌生。”新的工作环境并不能给他们以“家”的感觉,原有的企业文化遭到了破坏,这也是我们当今建设现代企业所要考虑的问题。

### 三 地方性知识的再现与建构

《苦楝树》的独到之处,还表现在地方性知识的出色运用方面。“地方性知识是一定地域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创造并不断积淀、发展和升华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和成就,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sup>[10]</sup>在小说里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地方性知识,一是小说中湘潭本土风俗人情的地域性表现,一是小说里的各种方言知识的运用。

鲁迅说,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或许也可以说,越是地方的,也就越是全国的。作为湘潭本土作家,楚荷最熟悉的就是湘潭所处的湖湘文化。讲在湘潭发生的故事,用湘潭人的方式展示湘潭人风貌,使其作品具有了“湘味儿”。从内容层面来说,就是讲述湘潭人的故事,即围绕湘潭某国有工厂的兴衰荣辱史以及工厂职工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来讲故事。从话语层面来分析,是用湘潭话语来建构“湘潭生活”。小说开篇就进入浓郁的湖湘文化氛围。开头第一句:“吴满好年轻,年轻得如许多老人说的:在冬天将他扔进湘江河,能烧开湘江水。”形容吴满的年轻,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词汇、句子,作者却选择了年轻得可以“烧开冬天的湘江水”这个看似特别却形象生动又实实在在只有在湘江河畔生活的人才说得出来的句子。

身处湖湘数十载,作者受本土文化影响很深,除了正式的书面语以外,他在语言上所流露出来的“湘话”逻辑随处可见。“瘦得一身找不到肉的半老男子”,这是讲“坏分子”瘦得“皮包骨头”,但作者从吴满的视角出发,用的湘潭人随口说来的口语。“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烧的烧开水,搞的搞搬运,做的做馒头。”其实本可以用“烧开水、搞搬运、做馒头”这三个短词就能表达意思,作者却改成了湘潭人或者说湖南人常用的语序、句式,读来具有浓郁的“湘话味”。“只是四五个老师傅在场,不好称里手。称里手,人家会嫌我。我师傅从不称里手。”“里手”是长沙、湘潭地区的方言。“吴

芸没像往常,家里来了客人,‘咯咯’笑得脆响,人喊得脆甜。”“脆甜”还算是平常书面里的词,但是“脆响”这个词也就只在湘潭等湘文化地区的人才常说。可以说“湘味儿”语言的运用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地方性叙事特点。

小说的地方性叙事,更体现在一些专门性行话的表现,这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作为一部工业题材小说,《苦楝树》通过某国企工厂内部职工之间的一些“行话”来表现传统国企人际关系特点。所谓隐语行话,“又称‘秘密语’、‘隐语’、‘行话’、‘市语’、‘切口’、‘春点’、‘锦语’、‘市语’、‘杂话’或‘黑话’等等,是某些社会集团或群体出于维护内部利益、协调内部人际关系的需要,而创制、使用的一种用于内部言语或非言语交际的,以遁辞隐义或谑譬指事为特征的封闭性、半封闭性符号体系,是一种特定的民俗语言现象。世界上各种语言几乎都无例外地存在使用民间秘密语的历史或现实。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民间秘密语,不免印有时代和群体的文化痕迹乃至政治、经济的烙印。”<sup>[11]</sup>

吴满所在的这个工厂就有这样的行话,“厂里形成一个规矩,对于技术工人,首先叫外号,或者叫本名,有了一些进步后,在姓前加个‘小’字,技术再好了些,是什么工种就将姓和工种联在一起,如朱焊工,伍车工,王钳工,技术再好一点儿,在姓前加个‘老’字,技术拔尖了,成了‘哥’。”“哥、老、工、小”的区分成为厂里论资排辈特有的标志,完全以技术高低来衡量,不与工资挂钩只体现个人技术能力,级别升降中不容有人情的偏护,是纯粹地技术上的“职称”差别。技术工人都以能得到更高一级的称号为工作目标。“满哥”就是通过不断地努力从“吴麻子”而“小吴”,到“吴电工”,以至“老吴”,最后被尊为“满哥”,成为厂里的“镇厂之宝”的。刘班长、老鬼因为能被认定为“刘哥”“小马”而激动不已。老李临死之际的唯一愿望就是能被“满哥”称作一声“李哥”,然而由于其水平实在不能达到一定境界,“满哥”仍然秉公拒绝。可见这种论资排辈对技术工人的重要性以及要求的严格性,“哥、老、工、小”的排辈成为这个厂里技术工人乃至全厂员工之间人际关系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行话,或许是并不存在的,就像那棵苦楝树,只是叙述者为渲染小说的象征气氛,而强行植

入的——整个阅读过程中,这种人为的痕迹,其实非常明显,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此感受。但这真实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提升了小说的品质,构成了小说独具魅力的一面。这给小说家们一个重要启示,拘泥于现实而不敢展开想象的翅膀,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这是本小说的一大发明,也是一大贡献。

总之,楚荷的《苦楝树》从史诗性的角度,贴近国企改革这一大事件,关注底层工人的生活 and 命运变革,揭示了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人性与文化之痛,展现湘潭本土风貌,是新世纪以来改革文学的又一力作。

#### 参考文献:

- [1] 胡适.论短篇小说[M]//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7.
- [2] 乔以钢.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B)[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178.
- [3] 黑格尔.美学: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7.
- [4] 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91.
- [5] 房伟.论当下小说创作中的史诗性倾向[J].艺术广角,2012(4):18-23.
- [6] 楚荷.希望工人日子一天天地好[J].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9(5):92.
- [7] 田文兵.国企改革小说的新视野——评楚荷长篇小说《苦楝树》[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3-36.
- [8] 韩佳泉,刘欣凯,隋玉林.国内企业文化研究综述[J].黑龙江电力,2005(3):161-164.
- [9] 邓蕾彬.当文学再度直面现实——评两部反思国企改革的力作《那儿》和《苦楝树》[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4):44-49.
- [10] 安富海.论地方性知识的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2):34-41.
- [11] 曲彦斌.现实社会生活视野下的隐语行话[J].学术交流,2010(1):133-138.

责任编辑:黄声波